孙中山的三次台湾之行

□冯 琳

孙中山的一生，始终把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作为奋斗目标。从甲午战败后的民族危机，到在台湾建立革命据点；从三次赴台的曲折经历，到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始终关怀台湾同胞的命运。“恢复台湾，巩固中华”正是对孙中山这一伟大志向的生动写照。

割台之痛强化了孙中山革命救国之志。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败后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悲愤。台湾军民不愿屈服于日本侵略者，奋起展开反割台斗争。日本侵占台湾，也给正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孙中山以深刻触动。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富强。同年11月，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宗旨，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特别是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让孙中山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和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更加坚定了以革命挽救中国的决心。1895年10月，他在《创立农学会倡言》中痛陈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这番话表达了孙中山对国家遭受侵略、领土被迫割让的愤慨，反映出他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虑。

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台湾的命运始终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紧密相连。此后，他通过派遣革命同志赴台、建立革命组织和联络网络等方式，持续关注台湾同胞的处境，支持他们参与祖国革命事业。

在台湾筹划惠州起义。日本侵占台湾后，孙中山始终没有忘记岛内同胞。1897年，他派兴中会重要成员陈少白前往台湾，秘密发展革命力量。

陈少白到达台北后，找到早先来到台湾的兴中会会员杨心如。杨心如与孙中山是故交，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赴台谋生，在台北良德洋行担任司账。他利用商业往来的便利条件，为革命者提供联络场所。陈少白通过杨心如逐步建立起兴中会台湾分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下，这个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宣传，只能利用商号、私人住宅及往来于海峡两岸的商人联络同志、募集经费、传播革命思想。当时的台湾虽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但两岸社会联系没有中断，祖国大陆的革命思想也持续传播到台湾。

1900年，中国局势剧烈动荡，孙中山认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计划发动惠州起义。9月24日，孙中山从日本出发，28日抵达基隆，随即前往台北，与杨心如等人取得联系，将临近广东、便于接济的台湾作为筹划惠州起义的重要据点。抵台后，他一面与广东起义人员保持联系，一面设法筹措军械和经费，并同日本有关人员周旋。台湾总督府出于自身政治考虑，一度支持其反清起义。孙中山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取得武器和财政援助，推动惠州起义。这一时期，台湾成为孙中山联络华南革命力量、争取外部援助的重要地点。

10月，郑士良率领革命军在惠州三洲田举事，一度取得战果。身在台北的孙中山密切关注战况，设法协调后援。然而，日本政局很快发生变化。伊藤博文组阁后，日本外务省向台湾总督府施加压力，禁止有关人员向起义军提供武器和援助。原先的援助承诺落空，惠州起义因后援不足等原因失败。日本殖民当局随后要求孙中山离开台湾。11月10日，他从基隆乘船返回日本，结束了历时约44天的第一次台湾之行。

激励台湾同胞参与祖国革命。孙中山在台湾建立的革命联系，逐渐发展为更有组织的活动，不少台湾青年加入革命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同胞参与祖国革命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罗福星是台湾革命志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赴台开展活动，1912年在苗栗一带联络同志、发展抗日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13年，组织活动遭日本警察破坏，罗福星被捕，1914年3月3日英勇就义。罗福星的英勇爱国事迹，彰显了台湾同胞对孙中山及中国革命事业的认同，体现出台湾革命志士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与祖国革命联系起来的坚定信念。

1913年，孙中山第二次经台湾赴日。这一年，他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祖国大陆，寻求继续革命的机会。8月4日，孙中山等人从福建马尾乘船出发，次日抵达基隆。随后，他前往台北御成町的“梅屋敷”旅舍短暂停留。日本外务省保存的电报记载，孙中山等人于8月5日上午6时抵达基隆，当日下午4时便乘“信浓丸”继续赴日，前后仅停留约10小时。此次行程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密切监视，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受到限制，稍作停留便匆匆离去。

1918年，孙中山第三次取道台湾。这一年，护法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日益尖锐。5月，孙中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准备赴日本。途经台湾时，他仍希望借此机会与台湾民众接触，宣传革命主张，唤起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然而，这一愿望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阻挠，孙中山未能与台湾同胞公开会面，随后继续乘船赴日。

三次台湾之行，孙中山都处在革命事业的艰难时期：第一次在台北筹划惠州起义；第二次在反袁斗争失败后赴台，寻求继续革命的机会；第三次则在护法运动受挫后希望接触台湾同胞。日本殖民当局的监视和限制，阻挠了他与台湾同胞的联系与见面，却无法割断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和密不可分的革命联系。

台湾雾峰林家的林祖密，是追随孙中山、支持祖国革命事业的代表人物。他不满日本殖民统治，1913年前往福建，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5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1月6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任命林祖密为闽南军司令，参与护法事业。任命状上钤有“孙文之印”和“大元帅印”，至今保存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这份任命状是孙中山重用台湾革命志士、支持其参与祖国革命事业的直接见证。

始终牵挂台湾不忘统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誓词中郑重表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又提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等主张。据记载，1912年5月，孙中山曾与罗福星谈及收复台湾问题，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予以收复。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他提出暂不亲自出面，但承诺如需军火，可向闽、粤两省都督联系，给予全力支持。1917年，朱执信根据孙中山的意愿撰写《中国存亡问题》，将台湾明确列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发表《军人精神教育》演讲，再次指出台湾等地“皆中国领土也”。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始终牵挂台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志向贯穿其革命生涯。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孙中山愈加认识到，必须反对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略，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与统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提出，凡外国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关税特权以及其他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都应取消，并重新订立平等条约。这一主张将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主权作为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其原则也涵盖《马关条约》造成的台湾割让问题。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试图为结束国内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寻找出路。24日，在日本接受采访时，他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仍然牵挂台湾同胞。他在病榻上曾谈到要废除中日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表达了对台湾同胞处境的深切关怀。3月，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再次嘱托，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直至生命最后阶段，孙中山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革命主张。他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志向，成为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台湾各界深感悲痛。《台湾民报》连续发表文章，追念这位中国革命领袖。台湾文学家赖和专门撰写挽联，其中“一统雄心伤未达”一句，寄托了对孙中山未竟事业的深切感怀，也表达了台湾同胞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的期盼。

1945年，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0月25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孙中山生前未能实现的台湾光复愿望，终于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成为现实。

中华春秋

以副刊为阵地启民智促进步

——『副刊大王』孙伏园的副刊事业

□管 婧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思想文化界，报纸副刊是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核心公共舆论载体。在这一阵地中，孙伏园（1894—1966年）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这位被誉为“副刊大王”的报人，先后主持《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两大重要副刊，以“副刊”为阵地推动新文学发展、传播进步思想。他的办报实践，始终与近代中国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同频共振。

初涉副刊。1918年，孙伏园与弟弟一同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正式转为正科生。在北京大学期间，孙伏园加入进步学生社团新潮社并任干事，参与编辑《新潮》月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崭露头角；此外，他还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由此正式开启其副刊生涯。

上任伊始，他便主动向鲁迅约稿，《寸铁》等杂文、《自言自语》等散文诗由此面世，鲁迅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也是在他的反复“催稿”下动笔翻译。“爱催稿”成了他鲜明的职业标签，鲁迅曾戏称他催稿时“笑嘻嘻”地登门，让人难以推脱。在孙伏园看来，这实则是鲁迅对后辈学人毫无保留的支持和托举：“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地给你助力。”

除约请名家外，孙伏园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借副刊版面为青年作者提供空间，使一些新生的文化力量得以在鲁迅周围聚拢。倘若说五四新文化的斗士们最初多是“散兵游勇”，那么孙伏园主编的副刊则将他们串联成阵，日渐形成一支向旧文化冲锋的生力军。这一时期的历练，也为孙伏园日后执掌大报副刊积累了宝贵经验。

主持《晨报副镌》。1920年，尚在求学的孙伏园接替李大钊主持《晨报》第七版的编辑工作，并着手进行改革。大学毕业后，他进一步推动副刊的独立改版，将《晨报》第七版扩充为四开四版的单张，随《晨报》附送。鲁迅初定刊名为“晨报附刊”，《晨报》总编辑蒲伯英题写报头时，因隶书字体限制写为“晨报副镌”。为尊重鲁迅原意，报头采用“晨报副镌”，报眉仍用“晨报附刊”，《晨报副镌》由此面世。这次改版不仅是形式上的革新，还使副刊从依附正报的“报屁股”转变为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更为“副刊”这一报刊体裁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最终定名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孙伏园的主持下，《晨报副镌》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方的堡垒”。他一方面大量译介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知名作家作品，系统引介世界文学新潮流与社会新思潮；另一方面倾力培育本土新文学。《阿Q正传》的诞生，堪称编辑与作者合作的佳话。1921年12月，孙伏园为筹办“开心话”栏目向鲁迅约稿，催发了鲁迅酝酿多年的创作构思，当晚便写出第一章《序》，数日后《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镌》上分章连载，这部经典作品由此被“催生”面世。

此外，郁达夫的散文、朱自清的评介文字也纷纷亮相；李大钊的系列文章持续刊发，瞿秋白的“旅俄通讯”连载40余篇。孙伏园还围绕妇女解放、劳工问题、教育革新等现实议题展开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22年5月5日推出的“马克思纪念专号”，更彰显了其鲜明的进步立场。

这一时期的《晨报副镌》几乎汇集了当时所有知名作家，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发行量与影响力稳居北京地区副刊之首，与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一同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南北两地最具代表性的副刊阵地。

创办《京报副刊》。正当《晨报副镌》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抽稿”风波彻底改变了其发展轨迹。1924年10月，《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认为鲁迅已发排的诗作《我的失恋》有讥讽之嫌，故将稿件强行抽下。据孙伏园回忆，他校对大样时发现稿件被撤已是愤懑，刘勉己又前来批评诗作“要不得”，盛怒之下两人发生激烈争执，次日孙伏园便递交了辞呈。10月31日，《晨报副镌》登出正式启事，宣告孙伏园离职。这场风波看似因一首诗而起，“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是孙伏园与《晨报》的编辑方针长期抵牾的结果。孙伏园辞职后，京报社社长、中共早期秘密党员邵飘萍随即向孙伏园发出邀约，请他主编《京报副刊》。起初孙伏园顾虑《京报》销量与影响力远不及《晨报》，不愿赴任，鲁迅却力劝他：“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

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正式创刊。邵飘萍对孙伏园给予充分信任，正报的广告收入也用于支持副刊运营。孙伏园将积累的办副刊经验悉数投入，延续了兼容并包又针砭时弊的风格。鲁迅一如既往地鼎力支持，先后供稿数十篇；陈毅、赵世炎等共产党人的文章也见诸报端。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报刊迫于租界当局的压力一度“噤若寒蝉”。《京报副刊》虽远在北京，却及时刊发大量声援文章与评论，如孙伏园的《游行示威以后》《此后的中国》等。《京报副刊》还将版面开放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会及进步社团用以发声，推出“上海惨剧特刊”“沪汉后援专刊”等“刊中刊”式特刊，公开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窗口。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京报副刊》还刊发了陈毅的《纪念列宁》、贺凯的《苏联革命纪念中的列宁》等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革命的文章，并在公共舆论空间中与《中国青年》等刊物遥相呼应，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力量的重要阵地。1926年4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后，孙伏园因长期主持进步副刊受到直接威胁，被迫于下半年离京南下。

1926年孙伏园在广州主持《国民日报》副刊，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为鲁迅赴广州任教做了大量筹备工作。1927年3月，他受邀主编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以“用学术的眼光，有趣味的文笔，记载与批评”为核心定位，公开刊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部分；还刊发了鲁迅的《无声的中国》，连载了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章。该副刊虽仅存续5个多月，却直接回应当时的农运争议、反帝反蒋等现实议题。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停办。

《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纵观其副刊生涯，他每主持一份副刊都能办出特色、开出风气。他以副刊为阵地，推动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传播进步思想、声援国民革命。他所开创的副刊，不仅重塑了中国现代报纸的版面格局，更为思想启蒙与社会进步搭建了重要的公共舆论平台，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人报史

福琼盗茶对世界茶叶格局的影响

□刘丽伟

1848年，福建武夷山茶区，一位蓄着发辫、说官话、自称北方茶商的“中国商人”在茶园里端详茶树的叶形，反复询问采摘与炒制的火候。没有人察觉此人实为苏格兰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他受英国东印度公司重金派遣，任务只有一个：窃取中国的茶树、茶种和制茶工艺，用以在英属殖民地进行种植与加工生产。此后数年间，成批茶苗与茶种运抵印度，同行的还有数名中国制茶工匠。不过半个世纪，印度和锡兰茶业崛起，中国茶叶独步天下的格局宣告终结。这不是战争，却比许多战争更残酷更彻底地改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

自17世纪茶叶传入欧洲，到18世纪饮茶成为英国全民习惯，中国几乎是世界唯一的茶叶供应地。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茶叶长期占中国出口总值的半数以上，在中国输入英国的货物中更占到八成至九成。英国每年输入茶叶以千万磅计，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对华贸易逆差越滚越大。为扭转逆差，英国商人利用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民，英国政府进而发动鸦片战争。但鸦片战争只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没有改变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茶叶既是晚清最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也是英国试图扭转对华逆差始终绕不开的核心症结。

鸦片战争前，茶叶问题在伦敦已由商业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1833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止，英国朝野开始谋划“把中国茶搬到自己的殖民地”。英国的算盘很清楚：谁掌握了种源与工艺，谁就掌握了定价权。与其年年给中国支付白银，不如在自己的殖民地上种茶。

福琼早年在爱丁堡植物园任采集员，1843年至1845年受英国伦敦园艺学会派遣来华采集观赏植物，熟谙中国社会与园艺实务。1848年，东印度公司重金聘请他再度赴华，以获取最优质的中国茶树与茶种，弄清制茶的全部工艺。为此，他剃发蓄辫，身着中国衣冠，学说官话，以中国商人身份深入内地。他先在上海落脚，后到达浙江、安徽、福建等茶区，并潜入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及徽州屯溪、松萝等绿茶产区，以窃取茶叶种质与制作工艺。

两个技术难题的解决，促使福琼将茶树成功引种印度。一是1829年英国人沃德发明的“沃德箱”。这是一种密闭玻璃箱，能让植物在长达数月的海运中保持成活，把原本极低的运输成活率大幅提高。此前英国人也曾多次从中国外运茶种及茶树苗，大多因长途海运而霉烂枯死。“沃德箱”的使用，是福琼盗茶后将茶树活体运至印度的关键。二是实地调查带来的制茶原理澄清。欧洲人长期误以为红茶与绿茶出自不同树种，福琼在各茶区反复比对后确认，二者同出一源，差别只在发酵与加工工艺。这一判断直接指导了此后印度茶园的生产组织。

而更隐蔽的一环是“人”，福琼在茶区物色技艺娴熟的制茶工匠，并予以重金利诱。1851年前后，他带着数万株茶苗、成箱茶种和八名中国制茶工匠离开中国，前往印度种茶制茶。茶苗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萨哈兰普尔苗圃培育驯化，之后再分散到阿萨姆、大吉岭等地。这些茶种与茶树苗被引种至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种植园，对印度茶业的起步与发展影响深远。

1839年，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在伦敦成立，实际种植地在英属印度的阿萨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末起，阿萨姆茶园陆续开园；自19世纪50年代中叶起，大吉岭茶园陆续开园。1867年，詹姆斯·泰勒在锡兰的卢尔康德拉建立了首个商业化茶园。此后数年，咖啡叶锈病蔓延成灾，摧毁了锡兰的咖啡园，殖民地资本顺势转向茶叶种植与生产。

福琼成功窃取茶叶种质和工艺后，英国依靠压榨殖民地人民的种植园制度，把土地、契约劳工和资本整合在一起开展大规模种茶，并运用现代生产组织方式使机器揉捻、分级与拼配等生产环节一应俱全，相较于中国分散的小农种茶模式更具规模优势。跨产地拼配与品牌化，使印度茶叶品质稳定、口味统一，恰好补上了中国茶“百山百味、靠天吃饭”的短板。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蒸汽船的使用，又大幅缩短了欧洲至印度的远洋航行时间，印度茶、锡兰茶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进入伦敦市场。1888年前后，英国市场上的印度茶销量首次超过中国茶。19世纪末，世界茶叶的供应中心已经悄然西移，全球茶叶格局从此重构。

种质资源是农业竞争力的物质基础。回过头看，福琼窃取的正是构成一国茶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禀赋。一是种质资源。茶叶垄断的物质基础是种源垄断。种质一旦外流并被异地复制，原产地赖以为凭的资源禀赋就会被“平移”，优势随之消解，今天全球种业的激烈竞争仍是这一逻辑的延续。二是生产技术。种子自己不会变成商品，福琼真正带走的是一整套可以运行的工艺体系，包括那些不在书本上、只能由工匠手把手传授的隐性知识。技术转移的要害从来不在图纸，而在人。三是产业主权与定价权。产业替代是夺取定价权最温和也最彻底的方式，不必割地赔款，只要让对手“不再是唯一供应者”，价格便不再由他决定。贸易优势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产业组织能力的产物。把1848年的福琼事件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放在一起看，会看得更清楚：坚船利炮负责打开市场，植物猎人负责抽走产业根基，一硬一软，共同服务于英国殖民扩张这同一个目标。这是一场以农业种质资源与生产技术为标的的跨国博弈，是殖民时代农业产业竞争的一个典型案例。

170多年前，福琼窃走茶苗、茶种与制茶工艺，促使印度和锡兰茶业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赶超中国茶业。如今这样的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其中的逻辑会不断重现。守住种质，就是守住茶业的根脉；做强产业，就是守住未来的底气。

环球史话